

## 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成立

### 苏维埃中央政府成立的准备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以后，赣西南与闽西根据地联成一片，形成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包括江西的瑞金、会昌、寻乌、安远、信丰、于都、兴国、宁都、广昌、石城、黎川和福建的建宁、泰宁、宁化、清流、归化、龙岩、长汀、连城、上杭、永定等二十一个县城的广大地区，拥有二百五十万人口，主力红军发展到五万人。在这个根据地内，建立了江西、福建两省苏维埃政府和县、区、乡的红色政权，普遍分配了土地。与此同时，闽浙赣、湘赣、湘鄂赣、鄂豫皖、湘西等革命根据地也得到了发展。全国苏维埃区域已扩大到十五、六万平方公里，拥有一千多万人口，建立了红军第一、四方面军和第二、六军团。至此，召开全国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苏维埃中央政府，以统一全国蓬勃发展的苏维埃运动的领导，已成为形势发展的需要，客观条件也趋于成熟。

党中央为建立苏维埃中央政府进行了长期的准备。早在1930年2月4日，中共中央就发出了《关于召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通告，指出：“苏维埃区域与红军的扩大的

确要成为决定新的革命高潮的主要动力之一。”党的策略必须更注意于全国各苏维埃区域与红军的联系，要使广大的农民政权与武装不仅在土地革命的过程中发展起来，并要使其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联合起来，更有组织性的行动起来，而成为新的革命高潮生长的一个直接动力。因此，中央特号召全国各级党部尤其是农村地方党部在群众中公开宣传今年五一节将开一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以联系全国苏维埃区域与红军，以统一中国革命的指导与行动。通告决定由中共中央和全国总工会为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主要发起单位，约请各苏区和红军的代表参加大会。2月15日中共中央和全国总工会发表《召集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宣言》。宣言指出：“在目前革命形势发展的前面，一个非常主要的任务就是要使全国的革命斗争有适当的配合，尤其是城市与农村斗争的配合。”宣言宣布5月30日召集全国苏维埃区域的代表大会，解决当前的一切重要问题。广东、广西、福建、江西、湖南、湖北、安徽、河南、四川，各苏维埃区域，各红军，各游击队及其他各省之一切农民团体与武装组织，都希望各派其主要负责代表，来参加这一全国伟大的革命的代表会议。这个会议必然对于全国工农革命运动——特别是苏维埃与红军——有非常伟大的帮助，它必然指出许多共体的政治任务及策略路线，以更迅速的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推翻豪绅资产阶级的政权建立工农苏维埃政府。

1930年5月20日，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参加大会的有各苏维埃区域和红军、各主要省区和产业中心、各革命团体的代表共四十九人。会议通过了《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苏维埃组织法》、《土地暂行法》、《劳

动保护法》等决议和法令，发表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宣言》。在大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中宣布了全国苏维埃政府的十大政纲：（一）取消帝国主义一切特权，没收帝国主义在华一切财产；（二）消灭军阀制度与官僚制度；（三）颁布劳动保护法令；（四）颁布土地法令；（五）实现国内少数民族自决；（六）革命群众的言论结社罢工的自由；（七）取消苛捐杂税；（八）设立农民银行消灭高利贷资本；（九）建设水利改良农业；（十）联合苏联援助殖民地革命。大会确定了苏维埃区域的具体任务与策略路线，指出：“苏维埃区域是革命的主要力量之一，他的任务不仅仅是注意自己区域的保护与建设，而是用尽一切力量力争全国革命的胜利。”实现这些任务的策略路线是：必须“克服一切地方主义与保守观念”；“彻底肃清富农路线”；“集中武装，扩大红军，向交通要道及主要城市发展”；红军的“战略与战术必须是集中进攻，歼灭敌人较大的部队，夺取主要的城市。只有这样的战略才足以配合农村斗争城市斗争及兵士兵变的发展，至于分散游击，原则上不能再视为战略，乃是某一时候的战术”；凡此一切均只有在向外发展力争全国革命胜利的总方针下，方可以正确执行”。大会主席团在最后一次会议上，决定于1930年11月7日召开第一次全国工农兵贫民苏维埃大会，成立苏维埃中央政府；并决定由中共中央、全国总工会、各苏维埃区域、各红军、各革命团体的代表组成全国苏维埃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以领导全国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是在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形成前夕召开的。因此，大会通过的决议和法令中，包含着若干“左”的错误。但是，这次大会对于促进全国“一苏大”的召开和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成立，仍然起了

宣传和号召作用。

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后不久，共产国际于 6 月作出了《共产国际执委政治秘书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对建立苏维埃中央政府及其任务作了指示：中国“苏维埃运动在党面前提出第一等重要任务，即组织苏维埃中央政府，并改善这个政府的工作”。“临时革命政府的任务，是要联合和尽量统一农民运动”；同时自己应当成为使无产阶级能够在农民运动中获得领导权的形式，应该使自己能够亲自参加革命政府底下各级机关”。为了作好召开全国“一苏大”建立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准备，根据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主席团的决定，在中央准备委员会成立以前，由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全国总工会、少共中央、革命互济总会、上海总工联会、自由大同盟、反帝大同盟、社会科学家联盟、左翼作家联盟等九单位组织了一个全国苏维埃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临时常务委员会，执行中央准备委员会职权，筹备中央准备委员会会议。7 月 23 日临时常务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推定中共中央代表为临时常委的主席，全总代表为秘书长，少共中央代表为组织部长，左联代表为宣传部长，社联代表为机关报编辑主任，上海工联、反帝大同盟、自由大同盟和互济总会代表为编辑委员。临时常委会于 7 月间向全国四十五个单位发出邀请书，要求他们派代表，于 8 月中旬出席全国苏维埃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成立大会。这四十五个单位是：中共中央、少共中央、全国总工会、铁路总工会、海员总工会、革命互济总会、上海总工联会、天津总工会、湖北省总工会、广东总工会、哈尔滨总工会、赣西南苏区、赣东北苏区、闽西苏区、闽北苏区、鄂东北苏区、鄂西苏区、鄂东苏区、东江苏区、海陆丰苏区、琼崖苏区、湘赣边苏区、通

海苏区、左右江苏区、皖西苏区、京东苏区、直南苏区、延吉苏区、红一军、红二军、红三军、红四军、红五军、红六军、红七军、红八军、红十一军、红十二军、反帝大同盟、自由大同盟、左翼作家联盟、社会科学家联盟、上海革命学生会、北平革命学生会、哈尔滨革命学生会。全国苏维埃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的任务是：“积极进行鼓动、宣传和组织等工作 以准备全国苏维埃大会，建立全国苏维埃，特别是要号召全国的工农兵贫民发动各种的斗争，积极准备武装暴动，以完成这历史上伟大的使命。”9月12日，全国苏维埃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全体会议在上海召开，到会代表超过原定人数三分之二。会议通过了选举条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根本法（宪法）大纲草案、土地暂行法、劳动法和全国苏维埃大会主要议程。由中共中央提出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根本法（宪法）大纲草案，确定苏维埃国家根本法的原则是：（一）实现真正代表极广大民众的民权主义；（二）实行劳动民众的政权；（三）彻底的实行妇女解放并保护女性的政治经济社会地位；（四）彻底的承认并实行民族自决；（五）争取并确立中国经济上政治上完全的解放；（六）实行工农民权革命独裁 更进于无产阶级独裁；（七）苏维埃的中国是工农自己管理的国家，在革命的阶段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会议确定全国苏维埃大会的主要议程是：通过政治报告及大会宣言；通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根本法草案和劳动、土地法；选举中央临时政府委员会。会议决定将中央准备委员会移到苏区，以便“公开的号召广大群众起来，准备全国苏维埃大会”同时决定将全国苏维埃大会延期到12月11日广州暴动纪念日举行 后因敌人对苏区发动第一次“围剿”决定推迟举行。

六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将全国苏维埃区域划分为六个特区，其中赣西南特区与湘鄂赣边区为苏维埃中心区，中央临时政府建立在此区。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央责成苏区中央局负责筹备召开全国“一苏大”成立苏维埃中央政府工作。1931年4月，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把在中央苏区建立苏维埃中央政府当作首要任务，决定“苏维埃大会的准备工作与号召，应当立即开始”。苏区中央局不久作出了《关于召集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6月1日发表了《苏区中央局为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宣言》。宣言指出：“在两个政权对立的形势下，革命火焰飞快的高涨，尤其是中国南方各省——江西、湖南、湖北、安徽、福建、广东、广西——的苏维埃区域，一天一天的巩固。各地方的红军，一天一天的壮大，这个革命势力的发展已经成为中国革命的坚固柱石。”“在这样的革命形势之下，召集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中国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就成为革命目前最迫切的需要了。”宣言宣布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于8月1日召开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6月20日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由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项英签署的第十四号通令：“因各地选举代表需要长时间才能竣事，加以交通困难，各地代表一时不能到齐，因此特决定将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改在十月革命纪念日（公历11月7日）举行。”8月3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中央苏区组织问题的决议》，确定“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候选名单，应由中央局决定，原则上应多推选各苏区的工农群众领袖，党的领袖只选能实际参加苏维埃政府的工作与一般的群众对他素有信仰的人。在白色统治区域做工作的人不宜多选”。在这前后，各地

选出了参加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至此，召开全国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宣告结束。

## 全国‘一苏大’的召开 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成立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的叶坪召开。参加大会的有江西中央区、闽西、湘赣（十日到）、湘鄂赣（十日到）、赣东北、湘鄂西、琼崖苏区的代表和红军、全总、海员的代表共六百一十人，朝鲜的来宾也参加了大会。大会开幕的盛况据《红旗周报》报道黎明举行阅兵典礼，晚间举行提灯庆祝。到会群众，人山人海。红光满天，庄严热烈空前未有。大会于万众欢呼之中，正式开幕。7日下午举行开幕式，由项英致开幕词。大会选举三十七人组成主席团，并推举项英、张鼎丞、陈正人、周以栗、朱德、曾山、邓广仁为主席团常务主席。大会的议程是：一、听取毛泽东代表中共苏区中央局作政治问题报告，项英作劳动法报告，张鼎丞作土地法报告，王稼祥作少数民族问题报告，邓广仁作工农检察处问题报告，讨论和通过苏维埃宪法大纲、劳动法、土地法等法令草案和红军问题、经济政策、工农检察处问题等决议草案；二、选举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成立苏维埃中央政府。

9日下午，毛泽东代表苏区中央局向大会作了政治问题报告。全体代表分为赣东、赣南、永吉泰、闽西、瑞金、红军和湘鄂西、赣东北、琼崖、海员七个代表团对报告进行了讨论。大会宣读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致“一苏大”的贺信。贺信指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成立，不

但是苏维埃革命在它斗争与胜利的道路上最大的成绩，它也将是全中国工农兵以及劳苦民众的一盏指路的明灯，号召在帝国主义与国民党铁蹄之下的他们起来为推翻他们的敌人而斗争，而且也将是全中国民众革命斗争的组织者与领导者！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告全中国工人与劳动民众书》，号召全中国的工人与劳动民众：只有消灭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权，建立我们工人与劳动民众自己的政权，苏维埃政权，我们才能从一切剥削者的铁蹄之下得到解放。在江西瑞金集合的全中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号召全中国的工人与劳动民众团结起来与武装起来，去实现这一目的，去为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全中国的胜利与巩固而斗争！12日，项英向大会作了劳动法草案报告。14日，张鼎丞向大会作了关于土地问题报告。15日，朱德向大会作了关于红军问题报告。16日，周以栗向大会作了关于经济政策报告。17日，王稼祥向大会作了关于少数民族问题报告，邓广云作了关于工农检察处问题报告。18日，大会听取了关于苏维埃宪法问题的报告。代表们对上述报告进行了热烈的讨论。19日，大会进行选举，产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毛泽东、项英、张国焘、周恩来、卢福坦、朱德、瞿秋白、张鼎丞、邓发、王稼祥、徐锡根、范乐春、陈绍禹、彭德怀、关向应、孔荷宠、方志敏任弼时、贺龙、沈泽民、谭震林、黄平、曾山、林彪、陈郁、罗登贤、夏曦、邓子恢、刘少奇、刘大朝、陈正人、袁德生、崔棋、屈登高、段德昌、葛耀山、彭轨、陈福元、古大存、韦拔群、张华先、何叔衡、黄甦、胡海、滕代远、肖恒太、罗炳辉、陈毅、张云逸、周以栗、卢德光、胡均鹤、徐特立、邵式平、洪紫清、刘光万、余汉朝、吴致民、刘建中、李宗伯、刘生元、王

永盛、阮啸仙等六十三人为中央执行委员，组成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为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闭会后最高政权机关。20日大会举行授旗章典礼 授予红一、二、三、四军和红三军团、红六、七、十、十二、十六军以红旗 并授予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八人以奖章。接着 由毛泽东、项英致闭幕词，宣布大会胜利闭幕。

从11月7日到20日，历时十四天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关于经济政策的决议案》和红军问题、工农检察处问题、少数民族问题等决议案 发表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对外宣言》 向全国和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于1931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节于（在）江西正式成立了。他 它是中国工农兵以及一切劳苦民众的政权 他 它是代替帝国主义与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的统治，并且继续号召与组织全中国劳苦民众起来推翻这一统治的政权。

11月2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并于中央执行委员会之下设立人民委员会，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行政机关。选举毛泽东为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王稼祥为外交人民委员，朱德为军事人民委员，项英为劳动人民委员，邓子恢为财政人民委员，张鼎丞为土地人民委员，瞿秋白为教育人民委员，周以栗为内务人民委员，张国焘为司法人民委员，何叔衡为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邓发为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任朱德、彭德怀、王稼祥、林彪、谭震林、叶剑英、孔荷宠、周恩

来、张国焘、邵式平、贺龙、毛泽东、徐祥谦、关向应、王盛荣等十五人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以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王稼祥为总政治部主任。

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召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正如《中国共产党为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告全国工农劳苦群众》书中所说的：这一大会是在革命危机日益生长情形之下，在英勇的工农红军第三次冲破敌人联合‘围剿’之后，在工农劳苦民众革命斗争日益开展，广大民众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各派统治，尤其是在广大民众力争满洲事变运动猛烈高涨的基础上开幕的。这一大会将成立中华工农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这一革命临时政府毫无疑问的将要成为全国工农革命运动的指导者与组织者。她将更燃起全国革命的火焰，最大限度地激发推进全国工农群众的革命斗争，使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血腥剥削制度与各派国民党反动统治更加震撼，动摇和崩溃，一直到根本颠覆他们。她将一定成为中国工农民主专政在全国范围内胜利和奠定的先声，创造中国新社会的序幕。并且她更要继承广州公社光荣的传统，成为东方被压迫民族革命解放的明灯，继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在世界革命史上写下新的伟大的一页。

（本文引自《中央根据地革命斗争史料》、《中央革命根据地史稿》作者戴向静等）

## 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

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前夕，1934年1月中旬，中共临时中央在瑞金召开了六届五中全会。出席会议的除中央委员及候补委员外，并有一些省委的代表参加。

五中全会讨论了以下三个问题：（一）目前的形势与党的任务；（二）国民党区域中的工人经济斗争与工会工作；（三）中国苏维埃运动与它的任务。全会补选了中央委员及候补委员，改选了政治局，并选举了中央党务委员会。全会于1月15日向苏联共产党、德国共产党发出了通电，向在狱同志和工农红军发出了致敬电。1月18日全会通过了《目前的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博古对全会作了总结。

五中全会机械地、毫无保留地照搬共产国际的基本论点，对当前形势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它不顾“左”倾教条主义所造成的中国革命运动的挫折，尤其是丧权辱国的淞沪协定以后国民党统治区人民抗日民主运动的挫折，盲目地断言“中国的革命危机已到了新的尖锐的阶段——直接革命形势在中国存在着”；它认为第五次“围剿”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向着中央苏区作绝望的进攻”，是“苏维埃道路与殖民地道路之间谁胜谁负”的时刻，红军进行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即是争取苏维埃中国完全胜利的斗争”，“这个胜利将实现一省数省的苏维埃革命首先胜利”；它对福建事变的分析也是错误的，认为

十九路军和‘人民革命政府’的‘一切空喊与革命的词句 只不过是一部分以前国民党的领袖及政客们的一种欺骗民众的把戏’，是“一部分的军阀与政客想以毁弃国民党的旗帜来引诱民众 而维持地主资产阶级之政权”；他们的政策与步骤与蒋介石国民党是没有区别的”；全会还毫不隐讳地认为，四中全会以后，中央政治局在艰苦的环境之下，忠实地执行着共产国际与四中全会的路线，坚持地进行了反对一切机会主义的倾向和动摇，粉碎了各种机会主义（如职工运动中之机会主义，北方落后论及苏区中的罗明路线等），在实际工作中间，开始了党的全部工作之彻底转变，得到了许多重要的成功与胜利。

全会从对形势的错误估量出发，提出了“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口号。全会在其通过的决议中认为，在新苏区与一部分边境区域内，土地问题“依然还是一个严重的问题”，那里屡次为党所指斥的错误的办法与‘富农路线’还是部分地或多或少地执行着。因此，“必须迅速地进行查田运动”。全会强调党必须“进行一个坚决的斗争 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反对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党才能够发展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全会大肆指责所谓“右倾机会主义者”什么怀疑革命的发展，忽视群众的力量，在敌人面前惊惶失措，妨碍革命运动的发展，降低工人斗争的水平和尾巴主义；什么“右倾机会主义者”在党的队伍之中散布悲观失望灰心丧气的叫喊，混乱我们的队伍，帮助敌人的进攻，引导革命到失败的道路；什么右倾机会主义者不常提出公开的政纲反对党的路线，更多的是将用两面派的态度在实际工作中对党的路线怠工等等。这些指责都是没有根据的。决议还错误地号召“党必须在理论上与实际上揭露右倾机会主义的面目，揭

露两面派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实质，保证党与共产国际路线的彻底的实现。

五中全会对即将召开的二次全苏大会党团发出了“指令”。“指令”提出：“为了争取苏维埃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胜胜利”，“二次苏大会必须继续为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的口号的实现而斗争”，“创造新的方面军 新的独立师团 新的游击队 来完成发展苏区与夺取中心城市的更高的任务。”“要求”坚决同游击主义的传统做斗争，以新的战术来重新教育我们的军事干部。”同时“指令提出要”彻底解决土地问题”认为“自从四中全会以来，我们已经纠正了过去立三路线的富农路线的错误”，“去年在中央苏区开展起来的查田运动 是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的武器”。今后的路线是 把查田运动的中心从先进的区域放到落后的区域。在土地分配得不正确的区域，必须发动广大群众起来重新分配。”指令还提出要“加强肃反”把“隐藏在苏维埃机关里面的阶级异己分子与害人虫尽量地洗刷出去”等等。

五中全会在组织上增选了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改选了中央政治局，设立了中央书记处，仍由博古负总责。

五中全会在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和反对“用两面派的态度在实际工作中对党的路线总工”等口号之下，继续发展了宗派主义的过火斗争和打击政策。

中共临时中央召开的六届五中全会，使党内第三次“左”倾错误发展到了顶点。

六届五中全会召开以后，为了总结两年来苏维埃运动的经验，加强对全国苏维埃运动的领导。扩大和巩固苏维埃政

权,1934年1月22日,在瑞金沙洲坝中央政府大厅召开了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

参加大会的代表有:江西一百九十六人(候补二十六人),福建七十九人(候补八人)粤赣六十三人(候补十二人)闽赣三十七人 红军一百一十七人(候补二十八人)地方武装十三人(候补九人)湘赣四十三人 闽浙赣四十五人 湘鄂赣三十人 鄂豫一人 四川一人 白区(上海、满洲、陕西、山东、河南、东江、香港、厦门和江西白区等地)廿七人 少数民族三人 爪哇一人,中央一级四十八人,共计七百多人,参加旁听的有一千五百人左右。大会选举了由七十五人组成的主席团,梁柏台为大会秘书长。大会首先由中央政府代表毛泽东致开幕词,然后,中共中央代表博古,全总代表刘少奇,少共中央代表凯丰,全国红军代表朱德分别讲了话。

大会期间,德国、日本、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共产党曾发来电报,对全国“二苏大”表示祝贺。

24日至25日,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代表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向大会作了长篇工作报告。报告概述了中国与世界革命发展的形势,总结了中央政府成立以来苏维埃运动在各方面的很可宝贵的经验,提出了当前的具体战斗任务。这个报告的大纲是:(一)目前形势与苏维埃运动的胜利;(二)帝国主义的进攻与苏维埃政府对于反帝运动的领导;(三)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围剿”与苏维埃政府反对“围剿”的斗争;(四)两年来苏维埃各项基本政策的实施,其中分为苏维埃的武装民众与建设红军、苏维埃的民主制度、苏维埃对于地主资产阶级的态度、苏维埃的劳动政策、苏维埃的土地革命、苏维埃的文化教育、苏维埃的婚姻制度、苏维埃的民族政策等十

项(五)苏维埃在粉碎五次“围剿”争取全国胜利面前的具体战斗任务，分别从红军建设、经济建设、苏维埃建设、领导反帝斗争与白区工作等方面进行了部署和说明。从 26 日至 27 日，全体与会代表就毛泽东的工作报告分组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根据代表们的讨论意见，毛泽东做了关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的结论。

毛泽东在结论中特别提出了两个问题加以阐述，一个是关心群众生活的问题，一个是注意工作方法的问题。

关于群众生活问题，毛泽东指出：“在我们的苏维埃机关中，曾经看见一些这样的情形，有的苏维埃人员只讲扩大红军、派夫子、收土地税、推销公债，其他事情呢，不讲也不管，甚至什么都不管。比如以前有一个时期的汀州市苏维埃政府，不管扩大红军动员运输队，对于群众生活问题一点不理。……因此也就极少成绩。”我郑重地向大会提出，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妇女同志要求学习犁耙，找什么人去教她们呢？小孩子要读书，列宁小学办起了没有呢？对面的木桥太狭会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许多人生疮害病，想个什么办法呢？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每个苏维埃都应当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应该讨论，应该解决，应该实行，应该检查。要使广大群众认识苏维埃是代表他们利益的，是与他们呼吸相通的。使们从这些出发，拥护苏维埃，来了解苏维埃提出来的更高的任务、革命战争的任务，把革命推到全国去的任务，来接受苏维埃的政治号召，来为苏维埃的胜利斗争到底。”又说，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拥护苏维埃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都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

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在苏维埃政府的周围团结起千百万群众来，发展我们绝大规模的革命战争，我们就能消灭一切反革命，我们就能夺取全中国！

关于工作方法问题，毛泽东指出：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要确定目的，而且要解决实现任务与达到目的的方法。我们的目的是过河，但没有桥不能过，不解决桥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第二次全苏大会之后，应该来一个彻底的转变。特别是那些严重的机会主义者与官僚主义者，他们不明了下层的情形，不理解群众的情绪，只知空谈空喊，甚至强迫命令来对付苏维埃工作。大会应该严厉的指责这些人员，他们的观点与方法是绝对错误的。大会以后，必定要用切实的办法来改善我们的工作，先进地方应该更加先进，落后地方应该赶上先进地方。

从 28 日至 31 日大会进行的日程是朱德作关于红军建设的报告，林伯渠作关于苏维埃经济建设的报告，吴亮平作关于苏维埃建设的报告，项英作关于宪法的报告。代表们分别就他们的报告进行了讨论，并由报告人做了结论。随后，大会通过了中央政府的工作报告、修正的苏维埃宪法及红军建设、经济建设、苏维埃建设等重要问题的决议案，通过了关于国徽、国旗、军旗的决定。

2 月 1 日上午，大会主席团推举罗迈宣读苏维埃中央政府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候选名单。经过酝酿讨论，大会一致通过以下列一百七十五人为正式中央执行委员：

博古、陈绍禹、何克全、刘少奇、毛泽东、项英、  
吴亮平、瞿秋白、周月林、金维映、黄发桂、谢玉钦、  
李富春、谢名仁、肖世榜、林国宋、黄长娇、蔡畅、

钟葆元、娄梦侠、张绩之、徐达志、曾山、钟昌桃、刘启耀、钟循仁、李卓然、刘广臣、谢先粟、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刘伯承、贺昌、何长工、滕代远、彭德怀、杨尚昆、林彪、聂荣臻、董振堂、刘伯坚、黄甦、蔡树藩、聂洪钧、王如痴、万永诚、陈光、寻淮洲、罗瑞卿、张纯清、周建屏、周昆、乐少华、陈阿金、袁国平、叶剑英、陈毅、毕士梯、陈洪时、肖克、孔荷宠、朱瑞、刘畴西、徐彦刚、陈昌浩、徐向前、张国焘、张琴秋、贺龙、关向应、夏曦、宋白民、王维周、罗炳辉、洪水、蔡乾、张然和、余宏文、王世泰、潘士忠、姜阿三、张冠一、古大存、郑振芬、朱琪、高俊亭、詹以锦、郑位三、王凤鸣、成仿吾、郭述申、张德三、祝维垣、顾作霖、邵式平、黄道、朱兆详、孔书安、刘晓、钟世斌、傅才秀、周义开、刘明辉、熊仙壁、刘国珠、钟桂新、罗迈、陈祥生、林伯渠、刘群先、胡海、范乐春、曾洪易、巫子元、张太和、黄宜章、张鼎丞、李见珍、吴兰甫、吴必先、邱先英、张闻天、陈云、王盛荣、邓发、陈潭秋、潘汉年、黄加高、张云仙、张金楼、周少文、何振吾、陈寿昌、黄光保、谭余保、刘士杰、王震、旷彪、彭仁昌、任弼时、吴德峰、王秀章、熊国炳、余洪远、李维海、何畏、李先念、曾广澜、周光坤、李成甲、陈子谦、方志敏、余汉朝、黄万生、汪金祥、关英、涂振农、关春香、吴玉章、朱地元、杨其鑫、邓振询、何叔衡、高自立、梁柏台、徐特立、阮啸仙、邓颖超、董必武、赵云、王贤选、罗梓铭、杨世殊、